

# 长庆会盟碑： 汉藏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 蒋爱花

作为一种地上文物，古代碑刻多被用于记生平、颂功德、警子孙，能够补充史书中缺乏的具体史实，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与典籍文献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在雪域高原拉萨矗立1200多年之久的长庆会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就见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汉藏民族之间的坚贞友谊。

古代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与中原地区在囊日松赞时期已经有了来往，并且从中原引进了历算和医学知识。但是，双方之间只限于民间交往，互派使者的高等级交流尚未出现。直到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才开启了唐蕃之间官方友好交往的大门。唐太宗出于稳定边疆的考虑，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成为中国古代和亲史上的美谈。《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高宗嗣位，授弄赞（即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来，高宗又加封松赞干布为赞王。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入蕃，嫁予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根据多种文献的记载，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两次和亲是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客观上促成吐蕃赞普确立与唐朝皇帝更为亲近的“外甥”身份，两者从普通的毗邻关系演变成“舅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唐朝与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每一次请婚、议亲、出嫁、会盟均是多次文化互访团，每一位成员都成为友好交往的参与者。唐朝与吐蕃之间关于边境问题偶有摩擦，双方采用了会盟的做法，其中具体划分边界的会盟共有三次：第一次会盟发生于733年，唐玄宗与赤德祖赞商议举行会盟，双方约定关系以和平为主，边界则以

赤岭为界。第二次会盟发生于783年，唐德宗与赤松德赞约定再续舅甥之好，在清水举行会盟。第三次会盟发生于长庆三年（823年），在此之前双方已有充分的铺垫。

821年，当听说唐穆宗李恒即位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使臣前来长安，一是向穆宗表示祝贺，二是请示双方会盟之事，唐穆宗表示同意。同年十月，唐蕃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礼部尚书论讷罗担任会盟专使，唐朝则派出了以崔植为首的17人使团，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长庆二年（822年），唐朝派出的和盟专使为当时的大理寺卿刘元鼎，他率领使团带着满满的诚意到达了吐蕃，与吐蕃官员钵阐布·勃阑伽允丹等人在逻些东郊会面，并在前期协商的基础上拟定了盟文的内容。在正式会盟之前，赤祖德赞专门接见并宴请了刘元鼎等人。会盟仪式由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主持，按照中原地区会盟的惯例，参与人员需要歃血为盟，但考虑到钵阐布·勃阑伽允丹的身份为僧人，最终只是饮用了郁金香水为盟。为了保证会盟的内容落到实处，会盟结束后双方还进一步探讨了相应的策略。其中，吐蕃派出使者跟随刘元鼎回到长安，为了强化双方共同信守诺言，吐蕃还派人到大夏川召集将领100余人宣读盟文。第二年，双方决定在逻些和长安分别设立纪念碑。为纪念长庆会盟取得的成果，唐朝与吐蕃双方分别在两地立碑，称为“舅甥和盟碑”。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所以这块碑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

如今，我们见到的长庆会盟碑上使用了汉藏两种文字，以合璧的形式刻写，强调了唐蕃之间“社稷如一”的友好关系。石碑的顶部有长方形的顶盖，上面镶嵌有顶珠。石碑的下部与底座已经因为时间久远而被埋在了地下，东面的文字主要追述了吐蕃自身的历史，回忆了

唐朝与吐蕃间的关系渊源。石碑西面刻有汉藏合璧的盟文，南面碑文刻有“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了参与立盟的18位唐朝官员的官位与姓名；北面碑文刻写“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了17位吐蕃官员的官位与姓名。两面石碑均采用了上面藏文、下面汉文合璧书写的形式，体现了会盟过程中的对等性原则。正如碑文所述：“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长庆会盟碑碑文所表达的主题清晰而坦诚，是唐蕃友好的直接见证。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汉文文献记载，石碑刻立的时间分别为吐蕃的铁牛年、水虎年和水兔年，即唐穆宗长庆年号的元年（821年）、二年（822年）和三年（823年）。在对汉藏两种古文献对比和互证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达成共同的观点：铁牛年（821年）冬季初月十日，在长安城的兴唐寺举行了唐朝的盟誓仪式。水虎年（822年）夏季中月六日，在逻些城的东面举行了吐蕃的盟誓仪式。水兔年（823年）春季中月十四日，双方议定的盟文刻写在石碑上，分别立于逻些与长安。至此，长庆会盟宣告完成。

唐朝与吐蕃之间有不少于10次的会盟，有8次明确见于史籍的记载。长庆会盟是双方会盟中最为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取得的效果有目共睹。长庆会盟重申了吐蕃与唐廷的甥舅亲谊，双方决定：“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伦替”“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闻闯寇盗之礼，复无惊恶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碑文情感真切无比、内容通俗流畅，即使千年之后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会

盟碑中反复强调“社稷如一统”，表达了双方希望维持和平关系的迫切心情。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提出，长庆会盟碑是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碑刻，也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从史料记载、出土文物等多重证据可以得出，长庆会盟碑是我国现存的珍贵的实物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庆会盟的内容以汉藏文字合璧刻写，采用了汉藏音译对照的形式，这为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碑刻提供了珍稀的视角，也为研究民族文字、语言翻译等提供了一手资料。碑文详细记载了长庆会盟的背景、过程、达成的共识以及官员名录，在形式上较为完备。碑文对历史的追溯较为详细，尤其是对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入藏年代、迎娶的赞普等有特别的记载，是历史真实事件的有力辅证。

更为重要的是，长庆会盟碑是汉藏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助互信的历史见证。和平友好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主流，长庆会盟符合汉藏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在唐朝与吐蕃的往来互动中，大批的唐人前往吐蕃，也有大量吐蕃人来到中原。唐朝先进的制度、领先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吐蕃，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陆续传到中原，频繁的技术与文化双向交流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



税收收入是当今美国政府财政收入

## 土地财政的起源

美国的土地财政，始于建国之初。为偿还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国内外债务、缓解信用崩溃造成的财政压力，美国中央政府制定并大力推行土地财政政策。

1783年，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中，除承认13块殖民地独立之外，还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佛罗里达以北、五大湖以南的英国殖民地，都划给了美国。这块土地的面积，足足有15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原来13块殖民地总面积（80万平方公里）的两倍。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成立联邦政府，只有一个从大陆会议转变来的邦联国会，协调13个州之间的事务。为处置这一大块土地，邦联国会先后出台了1784年《土地法令》、1785年《土地法令》和1787年《西北法令》，一方面规定了美国在新的土地上建立州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开创了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所以，美国的土地在建国之初并非完全归私人所有，而是部分私有、部分国有，而且国有土地远远超过私有土地。

邦联国会规定，将新领土划分为6个领地，任何一个领地的居民，达到2万人即可建立议会，达到6万人之后，就可以独立建州，新的州和原有的13个州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利。而邦联政府通过向新移民出售土地让其定居，是增加领地居民的主要途径。从1776年美国建国至1862年近百年间，美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的正是土地财政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偿从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再加上从法国拿破仑政府手中廉价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州，美国政府获得大量土地并通过倒卖土地大发横财。美国政府用1500万美元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高达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仅每英亩3美分。3美分/英亩买到的土地，转手卖给新移民，最低都是1.64美元/英亩，获利50多倍。当时联邦法律规定13个创始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联邦政府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出让金，美国土地财政由此兴起。

## 土地财政的发展与影响

邦联政府1785年《土地法令》于5月20日通过，确认了先测量后出售、大块拍卖、镇区制等土地出售的基本原则。联邦政府成立后，围绕如何利用广袤且尚未开发的西部土地，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主张“将西部土地大片出售给大地主公司，快速换取财政收入以解决美国的债务危机，同时积累资金优先促进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一派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主张“将西部土地以免费或相对廉价的方式分配给中小拓荒者等私人土地开发者，尽快开发土地并发展农业，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这种局面造成了美国早期土地财政领域的“汉密尔顿—杰斐逊”钟摆现象，两派思想共同对美国早期土地政策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究其本质，则是不同党派或集团之间的理念与利益之争。1785年《土地法令》中关于公共土地出售的最小面积单位为640英亩等规定，实际是通过抬高土地出售条件的方式，保护了土地投机者而非农民等私人开发者的利益。顺势而为，汉密尔顿一派的观点首先在土地政策确立之初占据了上风，大土地公司在这一时期几乎将土地交易垄断，1796年《土地法令》也基本遵循了1785年《土地法令》确立的精神和原则，并确立了土地信贷相关制度。但随着后续土地改革的推进及美国领土的不断扩张，杰斐逊一派的观点首先在其思想继承者的观点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如1800年《土地法令》设立了4个负责土地出售的土地局以便西部边疆的拓荒者购买土地，同时提高了购买土地的分期年限，降低了最低土地购买面积等。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杰斐逊一派思想逐步占据上风，以有偿购买为主的土地政策，快速推动了西部新开发土地的私有化进程。

概言之，18世纪末的美国土地财政主要是联邦政府通过出售大宗土地获得财政收入，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19世纪初美国土地财政的实质，是联邦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给中小开发者，在获取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1833—1837年，联邦政府依靠卖地收入已经基本偿清了所有债务，国库中还有大量盈余，从而巩固了

# 美国土地财政政策的 历史嬗变

□ 张学博

整个联邦的财政和国家信用——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至今这200多年间，仅有的几年“不欠债时期”。自美国建国至1862年近百年间，公共土地收入很快成为联邦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

从即时效果来看，美国当时的土地财政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前期极大助力了政府还清债务、充实国库，后期带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地方经济发展。但从综合效应来看，土地财政在发展农业、吸引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1814年至1818年的西部地产投机热，引发1819年美国的债务危机。为此，1820年《土地法令》中取消土地出售信用条款，并规定必须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土地价款、下调土地拍卖的最低价格和最小面积等，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地过于集中，同时有助于满足中小农户的购地需求。美国土地财政出现有利于中小农户购买的倾向，购地最小面积逐步减少，1832年时已下调至40英亩。大量中小农户购买土地，也使得美国土地交易空前火爆。

## 土地财政的终结

由于美国土地交易的火热与价格的暴涨，再加上金融政策调整与棉花种植产业链停摆，从西部地产投机开始的房地产泡沫被引爆，导致了1837年的“美国大恐慌”，银行倒闭、工商业破产、基础设施停工、失业率剧增等问题接连出现。大恐慌导致了全美房地产价格崩盘，市场交易几乎停滞，很多人失去土地和房产，大量土地被荒废，到处是烂尾楼房与工地，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处于停滞状态。1837年开始房价暴跌，1842—1843年，全美大部分地区房价跌至谷底，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随着房地产价格暴跌，购买联邦政府土地的居民数量急剧下滑，政府卖地收入锐减，导致联邦政府的整体收入锐减。

为激活土地市场，1841年永久性先占法《公地优先购买权法》被通过，标志着开荒者开始被赋予“先占人”的地位；而1854年通过的《土地价格递减法》规定，针对上市多年而没有销售掉的土地，按其上市时间成反比的规则重新核定新的上市价格，为后续免费对西部地区定居者供给宅地提供了过渡。时至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的《宅地法》则进一步加速了土地的分配，标志着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发展，但也预示着土地财政的终结。历时近百年的美国土地财政政策，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实施，也步入了尾声。



# 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

□ 张德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海外的高度关注，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参与，相关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显学。海外先后出版一批丰富多元的国史研究成果，涌现出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等知名研究学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元，但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辩证看待。

海外国史研究成果的领域颇为广泛，既有综合性研究，又有专题性研究，且作者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海外成果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物、社会、文化等方面面。这些成果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国史研究，普遍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在综合性的研究上，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日本学者宇野重昭等著：《现代中国历史（1949—1985）：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等较有代表性，讲述了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中国历史，但在史实叙述上也存在一些错误。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上，美国学者汤森、沃马克著《中国政治》、美国学者库恩等著《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英国学者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等书，关注了中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治理等问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视角审视中国政治。

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模式，海外对此颇为关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美国学者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美国学者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美国学者戴慕珍的《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意大利学者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等书，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经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金融改革等重要经济问题都有涉及，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了肯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妇女性别史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加拿大学者朱爱岚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著作，关注了当代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特别是从性别史视角考察妇女阶层的特殊性。

当前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探讨较多。澳大利亚学者方小平的《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美国学者魏美玲的《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等书，选题较有新意，涉及当代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等内容。

此外，海外学界还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问题。如瑞士学者卡普尔著《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德国学者弗朗克·泽林著《中国冲击：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重点关注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中美关系

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事务的努力。

在海外当代中国人物研究上，以对毛泽东的研究最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门推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包含美国学者施拉姆的《毛泽东》、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等10多部著作，涉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内容。另有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美国学者贝奇曼的《陈云》、美国学者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

从整体来看，在研究范式中，海外国史研究受到美国中国学研究转型影响，同样呈现了从“冲击—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国家—社会”范式的转变。当前的研究更加重视中国的主体性，从中国的自身来进行探讨，并注重在全球互动视角下审视当代中国史。海外学者习惯将某种理论运用到国史研究中，还善于创造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如“毛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铁三角”理论，“中国软实力”等，尽管看似新颖，但实际有些理论并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生搬硬套之嫌。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一些国外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研，搜集了一些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写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时曾走遍广东70多个县进行调研与资料搜集。由于海外作者身份比较多元，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外，还有一些是外交人员、记者等，故导致所著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外的一些著作对于一手档案史料的利用偏少，反而使用一些内容不实的二

手史料，未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导致内容叙述的错误，这种现象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较多体现。而且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及中文水平问题，一些国外作者对中文史料的解读存在误读，并不能准确理解史料背后的真实涵义。

此外，对于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应该加强对最新成果的翻译引进，特别是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相关国史研究成果的引进，充分借鉴吸收其研究方法、理论，并注重对国外收藏的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尤为重要的是，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成果不能盲目崇拜，而是要从学术视角进行平等对话与批判借鉴。要高度警惕海外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言论，如对于其涉及当代中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不当评论，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以及在史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意识形态偏见，等等。对此，国内学者也应及时在国外报刊撰文回应并进行批驳。同时，加强国内学者代表性成果的学术外译，增强国内成果在海外的学术影响力，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代中国伟大成就的正面学术宣传，从国史领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深入影响海外的国史研究，切实推动国史领域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